



南雍学术经典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汪辟疆诗学论集

上册



南京大学出版社

汪辟疆诗学论集

上册

张亚权 编撰



南京大学出版社

总 序

洪银兴

学术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在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世纪回眸”中，我们在重估和评价百年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就中国现代人文科学而言，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留下前辈学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他们的独辟蹊径汇成了我们的康庄大道。

众所周知，南京大学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百年高校之一。她有两个历史源头，一个是肇始于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创立的三江师范学堂。历史上各朝唯一的国家高等学府如太学、国子监等皆可称为“辟雍”，而明代曾于北京和南京各设一所国子监，号称“北雍”和“南雍”。因此，作为清政府创办于南京的新式学堂，三江师范在当时也就承膺了“南雍”的美誉。1914 年以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时期，1949 年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次年定名为南京大学。另一个是 1888 年（光绪十四年）成立的基督教会汇文书院，后来发展为金陵大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全国院系调整中与南京大学合并，构成了现在的南京大学。这样的经历不仅显示出她的悠久，还显示出她的坎坷——不断地更名，不断地重组、合并、调整。其实这正是中华民族近现代颠沛历史的缩影。而南京大学历经沧桑，卓然屹立，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传统，涌现出众多的名师大家，给我们留下丰硕的学术遗产，其中必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这大概就是南京大学的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其中“诚”字最为根本，也是南京大

学历史上最早的校训。“诚”是真实而不虚妄的真理,也是追求真理、诚信不欺的美德。

南京大学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是南京大学精神的典型体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民族文化的重建过程,中国现代人文社会发展史上充满了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科学、玄学的争论,“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是当时中国大学总体性的人文精神,而历史上的南京大学又提出过具有自我取向的“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人文与科学平衡”等学术主张和办学宗旨,可见南京大学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态度,走的是温故知新、继承创新的学术路径。她的两个历史源头已经显示出这样的学术趋向:一是建立在中国教育传统上的“新学”,但提倡国学、艺术与科学三者兼通融合;一是具有西学东渐背景的教会大学,却对中国文化重视有加,成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较早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这样的源头活水,不断地吸纳志同道合的名师大家,汇成源远流长、独立不迁的学术传统。

今天,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的时代,南京大学迈向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进程,我们饮水思源,愈加感到受益于这些名师大家们赋予我们的学术财富和精神力量,愈加渴望对他们蕴育的传统加以系统的研究总结,返本开新,发扬光大。

“南雍学术经典”丛书是南京大学历史上学术大师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精选。它吸收中国传统学术史中“学案”的编纂形式,邀请大师们的学术传人或研究专家,精选荟粹大师们的学术代表作,对其生平、学术加以述评并制作学术年表,再按不同的学科陆续分辑出版。这样一项研究性的出版工程,不仅勾勒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脉络,而且在新的视角下展示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精华,其中不乏首次被整理、公布的珍贵资料。同时,为了进一步展示20世纪南京大学的学术面貌和学术贡献,我们以后还将陆续推出其他学术大家的经典著述。我们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不仅是南京大学学术传统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且也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份极富价值的学术文献。

2008年3月28日

目 录

张宏生：诗史的发展与汪辟疆的近代诗学成就(代导读)	1
---------------------------------	---

汪辟疆论近代诗

近代诗派与地域(附吴棗小笺残本)	27
光宣诗坛点将录(新校本)	66
近代诗人小传稿	133
光宣以来诗坛旁记	150
论高密诗派	257

汪辟疆诗学分论

何谓诗	267
编述中国诗歌史的重要问题	272
汉魏诗选按语	278
校定宋临川内史《谢灵运集》后记	307
唯美诗人李义山	309
玉溪诗笺举例	330
《玉溪诗笺举例》补录	340
评方回《桐江续集》	369

汪辟疆诗学散论

论学书札 7 则	393
文集序跋 12 则	403
小奢摩馆胜录 32 则	408

读常见书斋小记 31 则	434
方湖日记幸存录 32 则	451
中华小说界 7 则	482
小说海 1 则	489
题跋手札 2 则	491

方湖诗钞及补遗

方湖诗钞	495
方湖诗词补遗	560

方湖学记简编

《汪辟疆文集》后记(程千帆)	613
读《汪辟疆文集》所想到的(傅璇琮)	619
汪辟疆先生传略(马骥程)	621
汪辟疆先生在四十年代的轶事(马骥程)	625
忆汪辟疆先生二三事(金启华)	631
怀念辟疆师(霍松林)	634
国学大师汪辟疆(汪吉佑)	641
南京爷爷(方方)	647
能于旖旎存风骨——文史学家汪辟疆传(乔玉钰)	652

汪辟疆学术简表

汪辟疆学术简表	667
编后记	697

诗史的发展与汪辟疆的近代诗学成就(代导读)

张宏生

汪国垣,字辟疆,又字笠云,号方湖,又号展庵。1887年12月17日生于江西省彭泽县。1903年考入河南客籍高等学堂,毕业后,于1909年被保送北京京师大学堂,1912年毕业(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所以,汪辟疆毕业时已是北大学生)。其后,曾短期任教于南昌省立二中,后于1922年任江西心远大学教授,兼文科主任。1925年,任教于北京女子大学。1928年改就第四中山大学之聘。其后,第四中山大学几经易名,先后有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之称,直到1949年以后的南京大学,汪辟疆一直在这里任教,前后达38年。1966年3月12日病逝,享年79岁。

汪辟疆5岁即入塾,一生治学不辍,文史兼通,是举世公认的国学大师。其治诗学通古达今,特别对近代诗学兴趣浓厚,自青年至老年,一直用力甚深,成果尤为学界所称道。

所谓“近代”,汪辟疆沿史家通例,断自道咸以后。他认为,道咸之后,不仅社会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诗学也同样如此。据此他指出:“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①不过,事实上不少诗人的创作活动多延至宣统甚至民国,所以,这个时间概念,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提法。

汪辟疆关于近代诗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代诗派与地域》、《光

①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275。以下引文凡出此书,仅注页数。

宣诗坛点将录》、《近代诗人小传稿》和《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等文中。《近代诗派与地域》原是1934年为金陵大学中文系所作的学术演讲稿,发表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2卷第2期,1943年重新刊布于《中国学报》第1卷第1期,后又略加修订,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前后跨越30年,而改动不多,可见是他一以贯之的观点。《光宣诗坛点将录》写成于1919年,1925年连载于《甲寅》第1卷第5号至第9号,1934年至1935年连载于《青鹤》第3卷第2期至第7期。1940年代中叶修改而成的定本在文革中被毁,现在通行本为程千帆师所整理。《近代诗人小传稿》和《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是为其拟议中的近代诗选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开始于抗日战争以前,其后续有增订,但由于各种原因,诗选没有最后完成,不过这两篇文章却以丰富的材料和精深的见解,仍有着独特的价值。

一、近代诗的价值

汪辟疆虽然没有写过现代意义上的诗史,但他心目中有一部完整的诗史存在,却是毫无疑义的,尤其对清诗,有着非常细致的辨析。他把清诗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康熙之间,虽然“才杰之士,各摭藻思”,但不过是“众制咸备,风会总杂”。陈子龙、顾炎武、陈恭尹、陈维崧、吴兆骞诸家,尚承明代前后七子的流风余韵。钱谦益和吴伟业稍稍振拔,也还有模仿之迹。后来王士禛号称一代宗主,海内宗奉,进境却只“植体大历,而略参宋贤”。此外,如朱彝尊、宋琬、查慎行等人,虽均为一时翘楚,自家面目仍然不够突出。第二期为乾嘉之间,堪称有清一代盛世,经史之学极为繁荣,但诗歌却萎靡不振。创作题材不外应制、游宴、祝贺、赠答、赋物、怀古、述征、题图等,缺乏深湛之思和回荡之妙,不过追求对仗工稳,声调铿锵,辞采华丽而已。从诗坛盟主沈德潜、袁枚,到一时名家赵翼、蒋士铨、张问陶等,在意境上都有欠缺。至于厉鹗、姚鼐、翁方纲、黎简诸人,虽然别有创造,但号召力不够,也未能形成大的气候。以上两个时

期,在汪辟疆看来,尽管形成不少热点,也有不少流派,但由于缺少自家面目,因而也就不是真正的转移诗坛风会。清诗真正有成就、有独特面目,是在第三期,也就是近代。自来学者论清诗,往往重两头,轻中间,汪辟疆却进而认为较之近代诗,不仅乾嘉之诗无足道,即康雍之诗亦多有不及,这是非常独特的见解。

汪辟疆心目中的近代诗,在时间上延续有清五个朝代,即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为时既长,因而也可分为道咸和同光(宣)两段。道咸年间,清朝由盛而衰,外有列强窥伺,内有朋党迭起,忧国忧民之士,往往着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发之于诗,风格自然发生变化,代表作家有龚自珍、魏源、陈沆、何绍基、曾国藩、郑珍等人。延至同光(宣),国家局势不仅难追乾嘉,甚至不如道咸。所以,五十年间,诗人无论在朝在野,无论是显是达,发为歌咏,无不悯时伤乱,有文有质。同光体诗人如陈宝琛、张之洞、沈曾植、陈三立等是如此,外于同光体的诗人如黄遵宪、康有为、樊增祥、易顺鼎、王闿运、章炳麟、李慈铭、俞樾等也是如此。

当然,诗歌的创作成就和政治环境有关,却又不能完全相等。道咸以后的诗人在诗境上的探索是多方面的。汪辟疆认为,不仅“清诗之有面目可识者,当在近代”,而且当时以学宋为主的诗人,更能以其独创性,越宋人而上之,尤其难能可贵。近代诗超越宋诗的成就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宋诗承三唐之后,力破余地,务为新巧,大家如东坡、临川,亦复时弄狡狴,以求属对之工,使事之巧。如“鸭绿鹅黄”、“青州从事”、“乌有先生”之伦,已肇其端。南宋诸贤,迭相祖述,益趋新巧。近代诸家,虽尝问途宋人,然使事但求雅切,属对只取浑成。其异一也。诗歌以蕴蓄为极致。……两宋诗家,力求意境之高,终鲜洄漩之致,才高体大,如坡公、山谷、放翁、诚斋,颇有讥其太放太尽之病。临川早年意气自许,诗语惟意所向,不复更为涵蓄,晚年始造深婉不迫之境。则其他诸家伤于直率,更未能免。近代诗家虽尝学宋,然力惩刻露,有

惘惘不甘之情,故调高而思深,言近而旨远。其异二也。晚唐诗家,极研声律,一篇之内,音节谐美。宋人病其啾缓,救以古调,专事拗换,其运古入律者,往往古律不分。山谷、师川以力避谐熟之故,间为此体。末流所届,逮于余杭二赵、上饶二泉、江湖末派之伦,钩章棘句,至不可读,则力求生涩之过也。近代诸家,审音辨律,斟酌唐宋之间,具抑扬顿挫之能,有谐鬯不迫之趣。其异三也。……两宋诗家,承三唐声律极盛之后,独出手眼,别开面貌,其精思健笔,洵足惊人。然尔时作者,惜多不学:荆公《字说》,腾笑千古;东坡经学,尤甚粗疏。宛陵但汲流于乐府,后山只丐馥于杜陵。新安泛滥六经百氏,然天纵余事,时落理障;永嘉抗志内圣外王,然经籍镕液,终鲜变化。他如永嘉四灵,江湖末派,散精力于五言,穷物态于七字,空疏婣陋,更无论矣。近代诗家,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流风未泯,师承所在,学贵专门,偶出绪馀,从事吟咏,莫不镕铸经史,贯穿百家。故淹通经学,则有巢经、默深;精研许书,则有馥馥、匹园;擅长史地,则有春海、寐叟;通达治理,则有湘乡、南皮;殚精簿录,则有郎亭、东洲。其专为《骚》、《选》、盛唐,如湘绮、陶堂、白香、越缦、南海、余杭诸家,亦皆学术湛深,牢笼百氏,诗虽与宋殊途,要足与学相俦,则又两宋诸诗家所未逮也。

汪辟疆的这些看法在清末民初显得非常独特。事实上,当时学术界中不少人对有清一代诗的评价并不高。如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说:“国朝诗学凡数变,然发声清越,寄兴深微,且未逮元明,不论唐宋也。固由考据家变秀才为学究,亦由沈归愚以正宗二字行其陋说,袁子才又以性灵二字便其曲谈。风雅道衰,百有余年。其间黄仲则、黎二樵尚近于诗,亦滔滔清浅。下此者乃繁词以贡媚,隶事以逞才,品概既卑,则文章日下。采风者不能不三叹息也。”^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一也说:“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

① 转引自钱仲联:《清诗三百首》,长沙:岳麓书社,1985,页2。

已极。吴伟业之靡曼,王士禛之脆薄,号为开国宗匠。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迒。诸经师及诸古文家集中多亦有诗,则极拙劣之砌韵文耳。嘉道间,龚自珍、王昙、舒位号称新体,则粗犷浅薄。咸同后,竞宗宋诗,只益生硬,更无余味。其稍客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清代文艺美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①汪辟疆不仅能够看到清诗的价值所在,而且进一步从具体层面入手,揭示近代诗的特色,反映了他的识力和见解,是对文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在此之前,文学史上从未有人对近代诗给予这么高的评价。考虑到汪辟疆与清末民初诗人多有交往,或许不无溢美之处。但他精熟诗艺,又带有史家眼光,终非泛泛之论。当然,他的某些观点也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如他说宋人多不学,如果是指宋人治学不如清人精深,倒是事实;指宋人处理性情和学问在诗歌中的关系不如清人,也还恰当。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宋人比唐人博学,因而也使得诗歌面貌发生了变化。因此,对清人来说宋人是寡学,可对唐人来说,则又可以说是博学了,似乎还应该做更细致的分疏。

二、近代诗派与地域

诗歌发展到近代号称极盛,其诗人之多,诗风之繁,构成之复杂,活动之丰富,有着鲜明的特点。汪辟疆从风格与地域的关系入手,勾勒出近代诗的整体风貌,不仅是对近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而且使得整部文学史的面目也变得更为清楚起来。

汪辟疆把近代诗坛分为六派:第一是湖湘派,以王闿运为领袖,提倡汉魏六朝诗,和宋诗派相抗衡。第二是闽赣派,即同光派,以陈宝琛、郑孝胥、陈衍、陈三立为领袖,宗尚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兼及李白、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孟郊、梅尧臣、王安石、陈师道诸家,一时羽翼呼应者甚

① 《民国丛书》(上海:上海书店,1989影印),第1编,第6册,页169—170。

多,成为近代声势最大的一个流派。第三是河北派,以张之洞、张佩纶、柯劭忞为领袖,张祖继、王懿荣、李刚己、严修诸人为羽翼,推崇杜甫,出入韩愈、苏轼,虽然与闽赣派宗旨相近,但一为直溯杜甫,一为取径黄庭坚,又有不同。第四是江左(江浙)派,以俞樾、金和、李慈铭、冯煦为领袖,翁同龢、陈豪、顾云、朱铭盘、周家禄诸人为羽翼,取法唐人,宗风在钱起、刘长卿、温庭筠、李商隐之间。第五为岭南派,以朱次琦、康有为、黄遵宪、丘逢甲为领袖,谭宗浚、潘飞声、丁惠康、梁启超、麦孟华诸人为羽翼,或取法杜甫沉郁之境,或学习白居易讽谕之风,致力于社会变革,多以诗歌咏叹古今,指陈得失。第六为西蜀派,以刘光第、顾印愚、赵熙、王乃征为领袖,王秉恩、杨锐、宋育仁、傅增湘、邓谠诸人为羽翼,诗歌宗尚介于唐宋之间,追求绵远的情韵。这六派覆盖了中国近代诗歌创作的主要地区,也体现了近代诗歌的主要特色与成就。

汪辟疆学诗从江西诗派入,论诗也理所当然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他对诗派的划分和表述,和他所接受的资源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两部书(文章)应该特别提出来。

一是《江西诗社宗派图》。该图为南北宋之际吕本中所作,虽然原作失传,但在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赵彦卫《云麓漫钞》、王应麟《小学紺珠》和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等书中都有记载,诸家或有出入,大致上总数在二十五、六人左右。^①吕本中作图的用意,据其自述:“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予故录其名字,以遗来者。”^②对这份名单,晚宋刘克庄曾经表示异议,认为其中不尽是江西人:“派中如陈后山,彭城人;韩子苍,陵阳人;潘□(按当为邠)老,黄州人;夏均父、二林,蕲人;□(按当为晁)叔用、江子之,开封

① 参看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页310—311。

② 见《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前集,卷48,页327—328。又见《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6),卷14,页244。惟文字略有不同。

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非皆江西人也。”^①其实稍前的杨万里已经有过一个解释，其《江西宗派诗序》有云：“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②刘克庄坚持狭义的地域观，倒显得有些拘谨了。我们可以看到，杨万里所提出的这一原则被汪辟疆接了过来。他所开列的近代地域和诗派的名单，除了确实占籍者之外，也不乏外籍人士，如讨论近代最有成就的闽赣诗派，所包举诸人，袁昶、沈曾植是浙江人，范当世是江苏人，陈曾寿是湖北人，放在一起讨论，就是由于宗趣相同的缘故。

二是《瀛奎律髓》。《瀛奎律髓》为宋元之际方回所著。方氏学问诗功俱佳，尤长于论诗，但由于生平出处大节有亏，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现代学术史上，汪辟疆可能是最早全面论述方回诗歌创作和学术成就的学者。1930年代，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曾慨叹古经典籍散佚甚多，与黄侃谈到方回：“季刚论诗笃守师说，不及萧《选》以下，故所作多邻鲍、谢。四十以后，涉览既多，悬鹄亦降。偶事吟咏，称心而言。心抚手追者，不仅开宝诸公，即宋之临川、坡公，金之遗山，元之道园，下及清人钱东涧、厉樊榭，亦复时时拟之。宋元诗论，在季刚晚年固未尝废弃也。乃知齿及《桐江》一集，宁非无故。”^③方回的人品，见之于周密《癸辛杂识》，极为卑污^④，汪辟疆亦深表不齿，但论其学术文章，则予以高度评价：

其学私淑紫阳，又亟称真西山、魏鹤山两翁。治经以注疏为先，析理以宋五子为至。求掌故于《通典》，明治乱于《通鉴》。文则秦、汉、韩、柳以及欧、苏，诗则骚、经、苏、李、建安、陶公以及李、杜、韦、柳、欧、梅、黄、陈，而又语以博约之要，参伍之方，皆趋向甚正。……平心而论，宋诗至乾淳以后，江湖一派风起云蒸，

① 四部丛刊本《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5，页7，“江西诗派”条。

② 四部丛刊本《诚斋集》，卷79，页11。

③ 汪辟疆：《评方回〈桐江续集〉》，《汪辟疆文集》，页231。

④ 周密记载方回事非常详细，其中或有出于个人成见者，和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都有密切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当另文探讨。

诗格卑靡,侪诸魔道。虚谷生际其间,远宗栗里,近法浣花,而又标举宛陵、山谷、后山、简斋、紫薇、二泉(赵蕃及韩淲父子)、二赵(赵汝谈、汝说),力辟四灵、后村、江湖之学姚合、许浑一派,斥为亡国之音。力挽颓流,最诸古澹,则又未始非卓然自立者也。^①

至于论诗,方回则“尊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又手定唐宋五七言律诗体曰《瀛奎律髓》,论诗之外,兼及遗闻旧事。元明而后,流传弗衰。”“迄于近代,则又以举世崇尚宋诗之故”,“有奉为枕中鸿秘者”^②。汪辟疆所说当时把《瀛奎律髓》奉为“枕中鸿秘”者,或许暗指陈衍,因为汪氏在《评方回〈桐江续集〉》一文中认为陈衍的生平著述都与方回相近,“三元”、“同光”之论也和方回“一祖三宗”说深有渊源。但汪辟疆虽然对方回和陈衍都有微辞,其本身取向是江西宗风,所以对《瀛奎律髓》褒多于贬,其论近代诗派,揭橥领袖、羽翼之说,显然和《瀛奎律髓》所标举的宗祖之说有一定的关系。

三、近代诗系的重构

晚清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对其当代创作具有非常自觉的理论探讨意识。讨论近代诗学,陈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的《近代诗钞》和《石遗室诗话》以其对诗坛的了解和内行的评价,成为时人非常重视的诗学文献,也奠定了他诗坛领袖的地位。陈衍的某些诗歌理论,汪辟疆是赞同的,如陈氏《小草堂诗集序》论及清诗之变:“诗至晚清,同光以来,承道咸诸老薪向杜、韩为变《风》、变《雅》之后,益复变本加厉,言情感事,往往以突兀凌厉之笔,抒哀痛逼切之辞。甚且嘻笑怒骂,无所于恤。矫之者则为钩章棘句,僻涩聱牙,以致于志微噍杀,使读者悄然而不怡。然皆豪杰贤知之子乃能之,而非愚不肖者所及也。道咸以前则慑于文字之祸,吟咏所寄,

① 汪辟疆:《评方回〈桐江续集〉》,《汪辟疆文集》,页233—234。

② 同上。

大半模山范水,流连景光。即有感触,决不敢显然露其愤懑。间借咏物咏史,以附于比兴之体,盖先辈之矩矱类然也。自今日视之,则以为古处之衣冠而已。”^①这与汪辟疆对乾嘉诗坛的看法相同:“乾嘉之世,为有清一代全盛时期,经学小学,俱臻极盛,而诗歌不振。盖以时际升平,辞多愉悦,异时讽诵,了无动人。”^②但是,汪辟疆对陈衍的诗论也常不以为然,特别是对其享有盛名的《近代诗钞》,认为选录太杂,而且其福建同乡的作品入选太多,不免阿私。所以,汪辟疆在发表自己有关近代诗的看法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批评陈衍的意思。这当然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考虑到陈衍当时的诗坛领袖地位,如果汪辟疆对其理论有所解构的话,那就应该是出于建立自己近代诗学理论体系的目的。不妨以对王闳运的态度为例。

王闳运较陈衍年辈为尊,是前一个时期的诗坛领袖。王氏提倡汉魏六朝诗,略谓:“宋齐游晏,藻绘山川,齐梁巧思,寓言闺闼,皆言情之作。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虽理不充,犹可讽诵。近代儒生,深讳绮靡,故风雅之道息焉。”^③这和陈衍的宗风取向显然不同。陈衍对王闳运的整体评价很低,曾批评说:“王湘绮除《湘军志》外,诗文皆无可取。诗除一二可备他日史乘资料外,余皆落套。”^④这个“套”,正是指王闳运对汉魏六朝诗的尊崇。以王闳运诗坛的成就和实际地位来说,当然不至于如陈衍所说的那么不堪。陈之所以这样反对王,一则因为王是宋诗派和同光体之间最大的诗家,要宣扬尊宋理论,必须予以清算;二则王的影响力不小,当时诗人或曾信奉其诗说,如陈三立^⑤;或坚持其理论,如陈

① 《石遗室文集》四集,见钱仲联编:《陈衍诗论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下册,页1074—1075。

②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文集》,页279—280。

③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文集》,页294。

④ 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钱仲联编:《陈衍诗论合集》,上册,页1019。

⑤ 按当时尽管公认陈衍与陈三立齐名,但陈衍对陈三立的诗学评价却并不高,或者说:“陈散原文胜于诗”;或者说:“所谓高调者,音调响亮之谓也。如杜之‘风急天高’是也。《散原精舍诗》则正与此相反。”(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钱仲联编:《陈衍诗论合集》,上册,页1019)或许不无争领袖的意识,可以和其评价王闳运互参。

锐,其诗坛地位不容低估。

陈衍曾经在写于1901年的《沈乙盦诗序》中,借追溯十几年前旧事,称赞沈曾植是“同光体之魁杰”^①。可是到了1912年,其《石遗室诗话》在《庸言杂志》上连载时,又开宗明义借郑孝胥之口,说沈曾植仅是“能为同光体”^②。钱仲联认为,这一细微差别,反映了陈衍心态的变化。沈曾植得名甚早,陈衍追叙旧话,推其为魁杰,应是挟沈以自重。而“到清亡前后,陈衍的名声已逐渐增高,他以闽中诗派作为‘同光体’的主体,隐然以自己与郑孝胥为魁杰,所以1912年发表《石遗室诗话》时,沈的“‘同光体’之魁杰’”的资格,轻轻地改换成‘能为“同光体”’了。这一变换,说明了‘同光体’在民初,几乎成为闽派诗的代称的原因。”^③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陈衍的这种变化所体现的文学观念问题。

1899年,陈衍客居武昌时和沈曾植论诗,提出了“三元”的见解:“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据陈衍说,这一看法得到了沈曾植的赞同:“君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④可是,沈曾植1918年写《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看法就不尽相同:“吾尝谓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公于前二关均已通过,但着意通第三关,自有解脱月在。”^⑤而且,“尝谓”云云,也说明并非突然发明。

沈曾植和陈衍关于“三元”的异同,有着并不简单的思路。陈氏之说,所选择的学诗途径是从苏黄及江西诗派入手,经过韩愈,最后到达杜甫,或者反过来说,是诗歌由杜甫开始导引的必然之路,为宋诗和后来的宗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而沈曾植的诗学却并非宋调所能限制,陈衍《石

① 《沈乙盦诗序》,载《陈衍诗论合集》,下册,页1048。

② 《石遗室诗话》,卷1,第3条。载《陈衍诗论合集》,上册,页6。

③ 钱仲联:《论“同光体”》,《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3,页122。

④ 《石遗室诗话》,卷1,第4条。载《陈衍诗论合集》,上册,页9。

⑤ 《沈曾植未刊遗文》,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第3卷,页116。

遗室诗话》卷十一就指出他“以平原、康乐之骨采，写景纯、彭泽之思致”，和六朝深有渊源。考虑到沈曾植和王闾运的关系，则沈氏增加“元嘉”一关，就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陈衍之批评王闾运就不仅是领袖地位之争，也含有正本清源的意思。清代宋诗运动的先驱翁方纲曾提出：“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①，因而应该“由性情而合之学问”^②，可在实际操作上，更为重视的仍然是知识和义理，所以受到袁枚的强烈批评^③。翁氏的观点，发展到宋诗派，已经登峰造极。如宋诗派领袖程春泽就曾指出：“《诗》、《骚》之原，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世有俊才洒洒，倾倒一时，一遇鸿举巨制则瞠然无所措，无它，学问浅也。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④已经把学问强调到了不适当的程度，造成宋诗派的某些作品成为书本的展览，失去了诗歌本来的特色。同光体兴，显然对这一教训有所认识。所以陈衍说：“不先为诗人之诗，而径为学人之诗，往往终于学人，不到真诗人境界。盖学问有余，性情不足也。”^⑤尽管只是把性情当作诗的起点，但认为应该学问性情相济，仍然显得圆通。这和王闾运有什么关系呢？中国的诗歌传统，至六朝确立了“诗缘情”的标准，成为做诗的一个重要路向。王闾运推崇六朝诗，把性情提到应有的高度，正可以用来药治宋诗派过重学问之弊，有见之士如沈曾植等有可能正是从这里得到的资源。因此，尽管陈衍本人在性情与学问的思考上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湖湘之学，但他为了自己“广大教化主”的地位，仍然要极力加以反对。当然，沈曾植和王闾运的诗学观点未必完全相同，其《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就曾说过这样一件事：“记癸

① 翁方纲：《蛾术集序》，《复初斋文集》（清光绪丁丑年侯官李以烜刊本），卷4，页17下。

② 翁方纲：《徐昌谷诗论一》，同上卷8，页14。

③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5章，《学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理论的总结：翁方纲以宋诗为基点的诗学》。

④ 程恩泽：《金石题咏汇编序》，《程侍郎遗集初编》（《丛书集成初编》本），卷7，页143。

⑤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14，第16条。载《陈衍诗论合集》，页197。